

人民公社的当家人



135248/61



解放军战士社

人民公社的带头人
杜 敏等

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

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

1980年1月出版 册号80—02—145

前 言

这是一本介绍人民公社各级领导干部和业务干部模范事迹的书，是一本人人应该仔细一读的书。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，正在光芒万丈地普照全中国。人民公社化的伟大胜利，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，是和党中央、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，是和五亿农民的冲天干劲、革命热情分不开的，也是和成千上万的公社干部的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分不开的。公社干部是党的政策在农村中的具体执行者，是党在农村中的代表，没有他们的努力，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成就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他们是很有功绩的人，是党的好干部，是大公无私的，是有高尚的品质和共产主义风格的人，是在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党的政策。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热爱农村干部，支持他们的工作。这本书所介绍的几位农村干部，只是成千上万的农村好干部中的一部分，农村中象这样的好干部多得很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出党的政策，毛主席的号召，是怎样在农村中得到了体现。《共产党员王国藩》是建明人民公社的主任，他曾领导过有名的“穷棒子社”；把“穷棒子社”变成了富社。现在他领导的建明人民公社，也是人民公社的一面红旗。《李大贵和水》是写一个生产队长，为了兴修水利，怎样任劳任怨地工作，怎样和保守思想进行斗争的故事。《杨宏典》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总支

書記，他勤勤懇懇的工作作風，和為了群眾利益廢寢忘食、奮不顧身的精神，是非常動人的。《一個好黨員——肉孜·吐爾的》是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個人民公社的主任，他是一個不怕一切困難，而又能幫助別人克服困難的人，他的共產主義風格是人人佩服的。《建設山區的一面紅旗》和《干部的良友，群眾的知己》，都是寫公社的黨委書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質，和聯繫群眾的好作風的。《“放心主任”和“保險會計”》是寫兩個農村干部的優良品質的。以上這些公社干部的模範事迹，都是很動人的。讀了這些文章以後，就會使我們對公社干部，有進一步的正確理解和認識；也會使我們更加熱愛公社干部，支持和幫助他們的工作，把人民公社辦得更好，把我們祖國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。

目 录

- 共产党员王国藩 杜 敬 陈潔民 費 金 (1)
- 李大貴和水 中共湖北省委籌工作组 (15)
- 一个好党员——肉孜·吐尔的 韓文謙 王 安 (29)
- “放心主任”和“保險會計” 姚文錦 (35)
- 建設山区的一面紅旗 肖 明 高忆冰 (44)
- 楊宏典 李进挺 (51)
- 干部的良友 群众的知己 吳有德 (60)

共产党员王国藩

杜敬 陈泽民 费金

如果不是在遵化县西四十里铺，而是在我省或我国其他地方，提起王国藩来，都知道是全国闻名的老劳模，是勤俭办社的旗帜，是三条驴腿起家的“穷棒子社”的创始人，现在是拥有四千七百多户的建明人民公社的主任，是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，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有人由此可能得出结论说：王国藩可是一个“了不起的人物”了。可是，到了建明人民公社，到了王国藩的家乡西四十里铺，再打听王国藩，却会得到不同的印象。

普通一兵

这里流传着很多故事。

有一次，一个水利工作干部到建明公社来工作，王国藩正在喂牲口；见有客人来了，就烧水沏茶，热情招待。过了几天，那个干部要走了，遗憾地说：“几天都没看到王国藩，你们主任的架子可不小。”别人说：“架子还大？你来了就给你烧水。”他还是不知道谁是王国藩。等到他骑上驴要走了，旁边一个人无意中说了一句：“王藩！给他把驴赶一下。”这时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认为饲养员的那个



人，就是王国藩。

1958年春天，玉田县的贫民到建明社来帮助抗旱，有的人和王国藩在一个生产队里干活，却没有看出他就是王国藩。1957年6月，王国藩到抚宁县渤海公社“留学”，有几个妇女悄悄地隔墙窗户看他。一

个人指着王国藩向别人介绍，别人却说：“那是个庄稼人，怎能是王国藩呢！”

的确，看装束，看劳动，看同群众的关系，王国藩就是一个普通农民。直到现在，他没有穿过制服，没有买过鞋，总是穿粗布袜子，劳动的时候拾起一根甘薯蔓就当扎腿带。干起活来总是“打头”。1953年秋收的时候，三条腿腿拉庄稼有困难，有的社员不愿担，主张买牲口。但是，天还不明，王国藩就下地去担豆子，社员们远远看去，以为是有人偷庄稼，围了上去，一看，原来是主任，大家二话没说，就跟着担起来。这时候，王国藩说话了：“买牲口要花钱，有

了牲口还要吃草料，咱們剛剛办社，还没有那个力量呀！”人們都贊成老任的看法。直到現在，这个四千七百多戶的当家人还不断参加生产。开会休息的时候，他还要就近找点活干。我們問他現在参加劳动的可能性怎样，他說：“我們实行民主办社，事事都有人管，事情并不是那么多，还是可以参加劳动。”他的家屬呢？和他住在一条街上的一个老太太說：“國藩家里的人們，沒有吃閑飯的。國藩他大嫂是六十岁的人了，还在托兒所里当保育員。國藩媳婦現在有病，汉病的时候，带着好几个孩子，还是天天下地，下地回来还要捎着弄一筐柴禾，阴天下雨也不歇着。”

王國藩的劳动观点，产生了很深的影響。生产隊長杜宝，在他那个队是出勤率最高、劳动最好的，我們訪問他的时候，他說：“我們主任还带头生产呢，当队長的还有啥說的！”

只說王國藩是一个普通农民还不够，因为他是个共产党员。在党内，他仍然是个普通党员，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。建明公社党委书记赵涌兴同志对王國藩的評論是：組織观念强，思想意識好，不驕不傲，不計較个人得失。的确，王國藩总是在党的领导下老老实实地工作，还經常对公社管理委員會的干部們講，一定要服从党委的领导，听党委的話。比較大的事情，他总要先請示党委批准才办，从来不自作主張。不管到哪里开会回来，都要先向党委匯報。本来，党和人民給他的荣誉是很高的，可是他沒有一点驕傲情緒。为什么呢？他認為，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，所以党员才能作出成

績，而且黨員的工作又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，成績當然是黨的，不是個人的。有人曾經訪問過王國藩，寫了一個材料，王國藩看到那個材料上沒有強調黨的領導作用，他認為不合事實。

王國藩不爭名，也不爭利，從來不喊困難，只是忘我地為大家服務。剛剛辦起“勞棒子社”的時候，王國藩家曾經有好幾天沒有糧食吃，他還強打精神，不讓別人看出來。後來被人知道了，要分給他一點糧食，他說：“先給別人吧，我還有吃的。”以後餓得不象樣子了，有人給當時的區委書記趙涌興同志捎了個口信去：“你趕快到西鋪看看去吧！風把王國藩他們刮跑了。”趙涌興同志來了，打算給他們一點貸款。王國藩說：“還啥？區委放心吧！一個也餓不死。”趙涌興同志說：“還沒啥？看你那面色都變了。”王國藩笑了笑：“這不是餓的，本來就是這個色。”1955年，王國藩拉了一百二十元的虧空。社里分配收益的時候，打算給他一點照顧。王國藩堅決不同意，他說：“還是讓大家多分一點對生產有利，我少分一點也不致於鬧情緒。大家富了，我也窮不了。”北京一個學校請王國藩去作報告，事後給他寄來了幾十元作為酬勞，他却把錢交給了黨委，黨委書記認為他生活比較困難，可以留著自己用。他說：“大家作出的成績，我去辦了辦，怎能把錢給我呢！”

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後，王國藩就不斷地對公社幹部們講：“公社雖然大了，政社合一了，可是公社就是社員的家，對待群眾應當熱情。不要把公社當成一個機關，不要擺架

子，老年人来了要給他找个座，倒碗水。”

王国藩的优秀品质，对其他党员的影响也很深。生产队长杜宝，在开始当队长的时候，因为遇到很多困难，曾經暗自掉泪。但他很快就想起了：“我们主任说过，共产党员遇到困难不能低头，应当在农民当中起先锋队的作用。”于是有了信心，有了力量，挺起腰来，带领着队员们继续前进。现在杜宝已經成为模范队长。

王国藩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劳动者，普通的共产党员，就是生活在群众之中的这样一个平凡的人。

說話有根 办事有底

赵涌兴同志給我們講了一个故事。1958年，在一次制訂生产跃进计划的会议上，談到甘薯增产计划的时候，有一个社的主任站起来，高声地：“我们社保証亩产一百五十万斤！”有些人未加思索，立即报以一片掌声。輪到王国藩發言了，多少只眼睛集中在他身上。因为这是有名的劳动模范啊！而且，几年以来，他那个社的生产总是在直线上升，这次訂计划一定会压倒别的社。王国藩不慌不忙地說：“我們爭取亩产四万斤。”仅仅四万，这和一百五十万是什么比例呀！同人們的预料相距太远了，大家不由得一怔，有的人甚至投以蔑視的目光。王国藩看出了这个風头，依然穩穩地坐在那里。会后，王国藩找到那位保証亩产甘薯一百五十万斤的主任，开玩笑似地：“老王（那位主任也姓王），你看我有多重？”那位主任把王国藩端相了一下：“有一百二十

多斤。”王国藩说：“抹了零，就算一百斤吧！你就把我当成甘薯，一百五十万斤就需要象我这样大的一万五千块，摆在你那一亩地里看看摆下摆不下？”后来每逢提起这件事情，王国藩总是说：“党就是要我们老老实实嘛！能产多少就产多少，没边地说大话有啥好处呢！”

1958年制订农业增产计划和秋季计算产量的时候，王国藩和建明社的其他负责干部，都曾经被一些人看作有保守思想。甚至有的人提出：“你们这样保守，应当考虑建明社这个旗帜会不会倒的问题，应当考虑你们会不会受处分的问题。”但是，不管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这样的批评，他们都没有动摇党所教导他们的实事求是的作风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没有丝毫放松跃进的努力，没有向真正的保守思想让步。结果，建明社这面旗帜是越举越高了。就在这遍地石块、土质瘠薄的山区，1958年全公社平均每亩产粮四百八十八斤；原来的建明农业社那几个村，1958年平均每亩产粮六百零六斤，都比1957年的产量大大提高。全公社把近四百万斤余粮卖给了国家。

粮食打了多少就报多少，不能多报，也不能少报。西四十里铺的几个农民说：“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瞒过产，如果有人要瞒产，王主任不干。”1959年1月，不知又从什么地方刮来了一阵风，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字大大下降，西四十里铺降到三百多斤了。王国藩看着风头又不对，立即召开社员座谈会核实产量。社员们是最摸底细的，整天价生活在群众之中的王国藩也是不容易瞒过去的。座谈、算账、核对的结

果，發現有的人重报了損失糧食的数字，還有几个糧庫的存糧沒有統計上。终于把產量核實了。有本位主義思想的人，对核實產量不滿意，王國藩就深入群眾進行解釋，引導人們回憶過去，政府曾經年年給發救濟糧，發寒衣，現在我們吃飽了，住上新房了，隱瞞產量，怎能对得起党和政府呢！怎能对得起兄弟社呢！人們听了，口服心服。

1958年是太跃进。跃进的步子究竟应当迈多大，跃进的根据有哪些，建明公社党委和王國藩是心中有数。一向虛心的王國藩，很注意學習別人的經驗，也不斷到各地參觀訪問，但是什麼应当學習，什麼不应当學習，王國藩總是要根據本區的具體情況，經過分析，拿出自己的見解，提交党委討論。1958年，王國藩到一個地方去參觀，听人家介紹說要把群眾的旧房都拆掉，一律蓋新房，還要蓋樓；要辦大規模的敬老院，敬老院里的老人要蓋被子被子；公共食堂要放“衛星”等等。參觀回來之後，王國藩發了愁：怎麼辦呢？不學習吧，公家給拿着路費去參觀，不是白白浪費了嗎？學習吧，實在學習不起，也實在不該學習。後來有人催王國藩趕緊向人家學習，王國藩認為花很多錢辦那些事不行。經過公社党委討論，認為王國藩不硬搬那些作法是完全正確的。當時還有人批評王國藩：“現在是大跃进，你們還是按照你們那三條腿腿辦事？還那樣保守？”王國藩的回答是：“跃进是好，可是跃进也得看看底兒（基礎）。如果不管有多大底兒，想一步登天，還得回到我們二十三戶那條老路——要飯。”有人夸耀別的地方的食堂放“衛星”，吃的

好。王国藩說：“那个吃不長，咱們还是吃長远点好。”这个公社的部分食堂也曾經有一段时间吃的粮食多了一些，有着勤儉办社傳統的社員們提出了意見，王国藩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的意見反映到党委会，又召开老农座談会征求意见。公社党委根据群众的意見討論这个問題的时候指出：我們不能和別人比，該吃干的就吃干的，該吃稀的就吃稀的，一定要保持勤儉办社的傳統，一点都不能浪費。为了節約粮食，他們的公共食堂早就按照粮食定量供应标准实行了飯票制，节省了粮食归个人。实行这个办法，全社三个月就節約粮食三十七万斤。当时也曾經有人批評他們：吃飯还有定量，这叫什么“包吃”呢？但是，在处理类似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王国藩有一条原則：“不管別人怎么說，不管別的地方怎么办，自己心里沒底、自己社里沒底的事就不办。”这是不是保守呢？很多事实証明不是保守。王国藩和这个社的干部、社員們，总是保持着飽滿的革命热情，干劲十足。因此，在自然条件很不好的情況下，他們自从1952年冬天由二十三戶办起了“穷棒子社”，至今年年增产。按現在四十四个村組成的公社計算，1958年的粮食亩产量已經比1952年提高了兩倍多，比1954年翻了一番还多。如果只按西四十里鋪一个村計算，1958年的粮食亩产量比1952年提高了四倍。这怎能就是保守呢！

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，有人主張把社員私养的猪和宅旁菜地都收归公社所有。理由是成立公社了，又成立了公共食堂，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集体化的程度更高了，私人已沒有必

要养猪和种菜了；再就，如果还由私人养猪和经营宅旁菜地，就会影响公社的集体生产。这些意见，乍听起来，很有道理，是个进步的主张，听说当时有的地方已经这样作了，如果不跟着作，岂不显得落后了。但是，建明公社党委和王国藩，却没有那样简单地处理这些问题。在公社化运动中，在一片跃进声中，他们都怀着满腔热情投入了跃进的洪流，但是却没有热到冲昏头脑，忘记了冷静分析。还是和平时一样，他们仍然是那样冷静，考虑得很周到，而且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对发展生产有利。仔细衡量的结果，如果不允许私人养猪，都归公社，猪只必然减少，这对完成国家收购生猪的计划、对积肥、对生产、对增加社员收入都是不利的，于是当机立断：允许社员继续私养猪只，并且发给饲料。果然，从去年的公社化运动到现在，这个公社的猪只一直增加，只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2月四个月就增加了四千多头，有的时候连母猪肚里的仔猪都有人预先訂購。因而他们每次都超额完成了国家收购生猪的计划。

宅旁菜地怎么办呢？开始是收归公社了，但是王国藩他们又想：如果立即交给公社经营，一小片一小片的，公社照顾不过来，鸡踉狗蹶的就都糟蹋了，啥也收不了，所以不如干脆说一句痛快话，是谁的还归谁经营收获，明年再说。到了1958年12月，公社党委再次考虑这个问题，认为收归公社不如仍归社员对生产有利，于是请示县委批准，宣布宅旁菜地仍归社员私有。果然，社员们利用空闲时间，在自己菜地边上插上点树枝，围上点秫秸，经营得很好，家家不缺菜吃。公

社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影响,相反地,社員們干着更有勁了。

“一切經過試驗”,這是他們堅持不渝的領導方法。1958年,有人提出中小學學生要實行下宿制,民兵要集體住宿。還有人說,建明社得先作。建明公社黨委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,趙涌興、王國藩等同志提出,如果非搞不可,一定要先搞試驗點。試驗結果,證明行不通。1958年推行小麥密植的時候,有人提出要每畝播種一百斤。王國藩說:“這個咱們沒有經驗,如果一定要這樣作,先種幾分地作個試驗,成功了是經驗,失敗了損失也不大。”試驗結果是失敗了。如果不試驗就推廣,將造成很大損失。

建明公社黨委和王國藩,一直堅持着這種實事求是的作風,一切從有利於發展生產出發,一切按照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辦事,因而他們的工作總是踏踏實實,一步一個腳印,生產年年躍進。

商量 啓發 誘導

前邊介紹了王國藩的思緒作風以及他同群眾的關係,從中可以想見王國藩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是怎樣的。

走群眾路線,在王國藩說來,是一種完全自覺的行動。他說:“組織起來以前是幾百個幾千個當家的,現在這麼大的家業,如果只由少數幾個人當家怎能當好呢!”“有事同群眾商量,讓他們出注意,按照大伙的意見去办,他們感到自己當家作主了,干活幹着心窩。”他的經驗是:“不和大家商量,就不能順利完成工作任務。”從農民的談話當中,也

証明了王國藩十分了解群眾的心情。老社員王榮說：“大事和大伙商量商量，大伙心里痛快，干活也有勁。要不，就算你出的主意對，大伙心里窩窩囊囊的不舒展，干活也干不好。”

就是根據這些道理，王國藩很注意所取各個不同方面的意見。所干部的，又所群眾的；所青年的，又所老年的；所貧農的，又所中農的；所這一片的，又所那一片的；還要所婦女，所烈軍屬的。因為关系到農業生產方面的事情比較多，所以王國藩也特別注意听取老農的意見，不斷召開老農座談會。1957年春天推行密植的時候，一方面有技術推廣站作指導，一方面王國藩又召集老農座談。他對老農們說：

“實行密植，這是新技術，可是還得和你們的老經驗結合起來。我比你們年輕，懂得的少，你們經驗多，庄稼到底怎樣種，還得你們出主意。”幾句話就把老農們說笑了，大家高高兴兴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提出密植應當注意不同的土質，不同的水利條件，不同的作物，不同的品種等等。還有一次，社里打算買四百只羊，王國藩就召開了一個牧羊人座談會，征求大家的意見。“羊倌”們說：現在買四百只羊，到秋后再繁殖几百只，按照現在的條件，技術問題和羊棚問題都解決不了。他們的話有道理，社里就採納了他們的意見。

有些事情，經過商量，多數人同意了，還有少數人思想不通，怎麼辦呢？王國藩就登門拜訪，個別進行耐心的說服工作。很多時候是通過積極分子進行串連，帶動別人。最近同王國藩一起辦社的那二十三戶貧農，在以後的很長時間

內都是各种工作中的骨干，王国藩就通过他們去串連群众。工作作到了，有的时候还有个別思想不通的，王国藩又善于等待，等待他在事实面前提高覺悟，从来不用强迫命令的方法。比如薯种要浸种，別人都同意了，有一个社員还是不同意，他管理的五个薯炕只有四个浸了种，結果沒有浸种的那一炕薯秧就沒有長好。王国藩就用这个事实进行教育，从此再也没有不同意浸种的了。去年修渠的时候，有十几戶因为渠道要经过他們的前門，怕不能得利反而受害，不同意修。王国藩和社干部們研究，决定等待一下，先修小渠道流近地，給他們看看再說。結果那十几戶看到修渠果然有利，自己的菜地也受益了，高兴地找到社干部說：“赶紧修吧！在我們院里修也沒意見。”

对群众进行教育，王国藩不是只講空話，而是抓典型，摆事实，啓發群众回忆对比，引导群众自己教育自己。这也是群众路綫的方法。女社員樊翠伶說：“我們主任什么时候也不跟人們發脾气。誰要有什么缺点，主任一說就把你說乐了，你还是願意改。”樊翠伶的丈夫王升答了腔：“就是！有不願劳动的，主任就批評，他批評的讓你愛听，听完了就願劳动了。”他們夫妇俩介紹王国藩是这样講劳动的：“錢不花可以攢着，力气可是越不用越沒有，越劳动才越長力气。劳动为大伙，也是为自己。劳动的好，別人看着也好。落个懶汉的名声多难听啊！”他們說王国藩还常常拿王升的事实作典型教材。王升的眼坏了，扛長工没人要了，夫妇俩領着两个孩子，要了二十多年的飯，住着地主一个破草